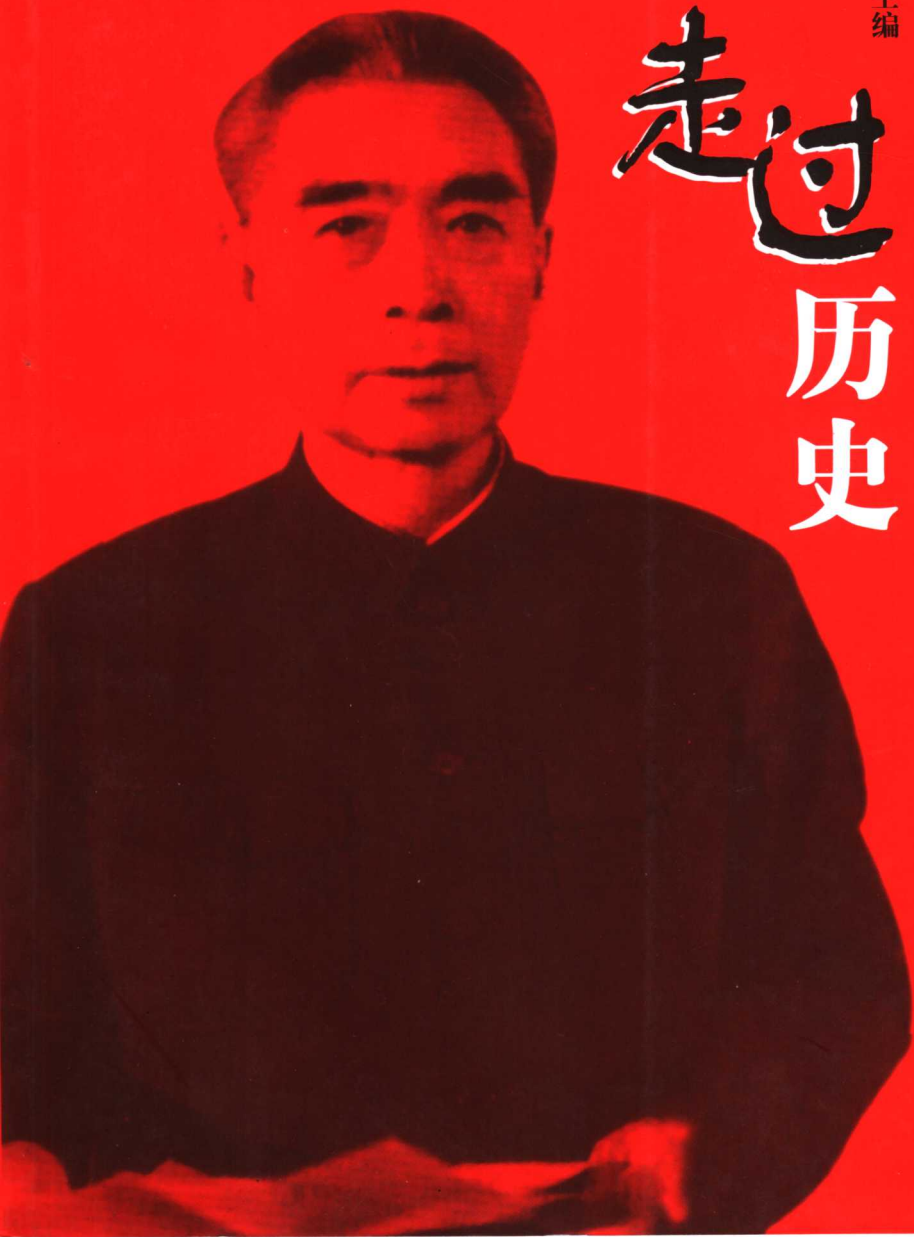


与周恩来一起

程美东 主编

走过历史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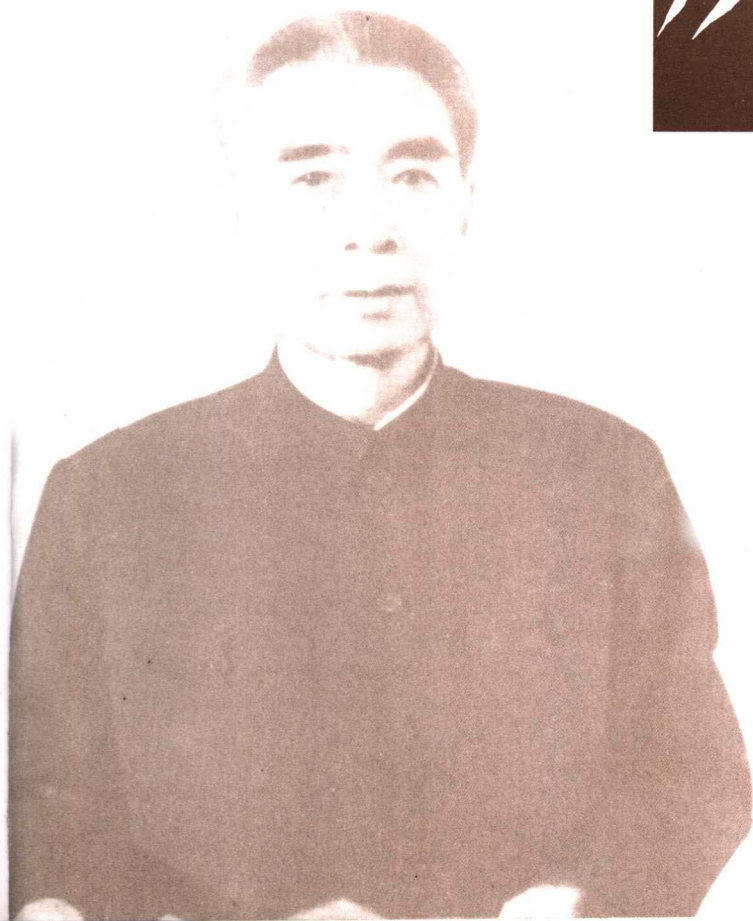
与周恩来一起走过

YUZHOUENLAIYIQI

ZOUGUOLISHI

程美东 主编

历史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周恩来一起走过历史/程美东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

ISBN 7 - 216 - 04443 - 6

I. 与…

II. 程…

III. 周恩来(1898 ~ 1976) — 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4439 号

与周恩来一起走过历史

程美东 主编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3.875

字数:410 千字

插页:1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 000

定价:28.00 元

书号:ISBN 7 - 216 - 04443 - 6/K · 462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 2 张申府：留法前后我同周恩来的交往
- 7 黄逸峰：周恩来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 17 刘武生：周恩来与南昌起义
- 28 金冲及：周恩来在一九二九年
- 57 徐彬如：周恩来整顿顺直省委
- 63 欧阳毅：周恩来同志在中央苏区二三事
- 68 李志民：周恩来与东方军
- 74 魏国禄：周恩来同志在长征中
- 98 龙飞虎：回忆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 118 石仲泉：周恩来与长江局
- 135 左仲平：忆周总理在曾家岩五十号
- 141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 194 卢绪章：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
- 199 童小鹏：周恩来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第二战场的斗争
- 214 于土 许真：周恩来在上海“周公馆”
- 228 周而复：在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
- 237 宋 平：周恩来在宣化店
- 241 许涤新：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目 录

下篇

- 254 童小鹏：周恩来与首届人民政协
267 杨采华：擘划大业的总理
275 萧克：周恩来与我军的正规化
现代化建设
281 李越然：红色外交家在日内瓦
293 黄镇：一次任重道远的历史性会议
300 张明军：跨越大西洋的握手
308 童小鹏：我随周恩来访问亚非欧十四国
323 吴冷西：周恩来与四年调整时期
341 钱三强：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的
领导者
350 钱学森：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355 熊华源：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
“总导演”
365 余秋里：七亿人民的“总管家”
370 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
378 穆欣：力挽狂澜
393 吴庆彤：回忆周总理在“文革”中同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
斗争
410 吴德：智捉“四大金刚”
418 童小鹏：化解中美之间的坚冰
432 姬鹏飞：中日建交纪实

上

篇

我与周恩来同志相识于1920年。

那一年的8月(暑假),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率领天津觉悟社一行20余人来到北京,他们访问了北京大学、少年中国学会及其他团体,倡议各方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改造旧的中国。

16日,天津觉悟社与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互助团等团体的代表,借座陶然亭的慈悲庵,议决共同“改造联合”。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出席了座谈会。这次会议,由刘清扬作主席,周恩来同志代表觉悟社讲话。他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活动情况和北京之行的目的。当时,恩来同志刚过20岁,思路敏捷,侃侃而谈,详细地论述了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我和李大钊即在会上发言表示赞同。那时,觉悟社社员以编号为名,恩来同志是五号,取其谐音,名叫伍豪,刘清扬是二十五号,叫念吾,邓颖超是一号,叫逸豪,他们在北京住了20多天,与各方面进行了联系。

陶然亭聚会,我和恩来同志得以相识,以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经常往来。周恩来同志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待人诚恳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上海、北京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小组有周佛海、田汉、沈雁冰等,北京除了李大钊和我,又发展了张国焘,以后又发展了高语罕、邓中夏、罗章龙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中法文化交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参加了发起和组织工作。



五四运动后，由于华法教育会的鼓吹和倡导，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许多有志青年为探求彻底改造中国的真理而踊跃报名，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国内军阀长期混战，民不聊生，到欧洲去寻求生活出路的。

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但是很缺教授，经别人介绍，他们找到我，其时我已在北大毕业留校并升为讲师。我接受了他们的聘请，赴法教逻辑。1920年底，我离开中国到了巴黎，住在巴黎大学对面的学校街50号。当时，中法大学尚未开学，我除了去大学听课就在宿舍看书。我是按公费留学生待遇，每月800法郎薪水，生活没有问题。



■ 中学时代的周恩来。

一到法国就见到周恩来同志，他是比我早到法国的。恩来同志告诉我，他曾有意到英国去学习，但英国生活水平高，且不宜读书，所以没住多久很快便回到法国。周恩来同志住在巴黎南郊的一个小镇——哥伦布，这里到巴黎坐火车大约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在一个补习学校补习法文。

出国前我曾受陈独秀的委托，在国外继续发展党的组织，这样在1921年2月左右，我即介绍刘清扬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我们又一起作了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

此后，赵世炎、陈公培相继来到法国，他们是通过国内关系入党的。不久，我们5人组织了巴黎共产党小组，大家都明确是共产党员，但对外并



■ 1922年在柏林周恩来(右二)与张申府(右四)、刘清扬(右三)等合影。

不公开。

巴黎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在留学生中开展活动,具体地说做了两件事,一是筹备出版了机关刊物《少年》。筹办初期,没有经费,有一位名谢成瑞的学生(他与周恩来是天津的同学)和章士钊关系密切,恰好章正在欧洲游历,这样周恩来就通过谢成瑞向章士钊募捐,得到了1000法郎的资助,买了机器、纸张,解决了资金问题。

1922年8月1日,《少年》在巴黎正式创刊。这是一本油印的16开本,封面是红色的。我和恩来同志经常为《少年》写稿,并做了一些编辑工作。刻写蜡版和油印的工作主要是由陈延年、陈乔年两同志担任的。我们写文章都用笔名,我以“R”为名,恩来同志仍用“伍豪”这个名字。

《少年》以宣传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一方面,它大力阐扬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另一方面,同勤工俭学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及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此外,《少年》还登载了共产国际的文件,报道世界工人、青年运动和中国青年的消息,由于《少年》具有鲜明的特点,吸引了不少青年。

1922年4月26日,赵世炎同志在致吴明(陈公培)的信中说:“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这是旅法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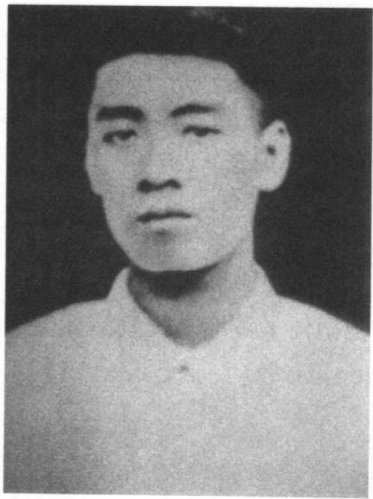


小组做的第二件事。我们曾就成立共青团一事进行过多次酝酿讨论,但由于党小组是不公开的组织,因此,在整个筹建工作中我们未用过党组织的名义。

旅法小组5人中,除陈公培已于1921年10月因里昂事件被驱逐回国外,其余4人都参加了组织旅欧青年团的工作,尤其是周恩来和赵世炎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组织工作,其时我在德国,曾就这个问题与赵世炎多次通信,和国内党中央也通过信。

1921年9月下旬,发生了留法学生要求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事情大略是这样的:李石曾等人曾在国内大力提倡勤工俭学,但事实上,学生们到了法国,找工作不容易,上学更不容易。生活困难,也没有固定的住处。中法当局又指使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宣告,从1921年9月15日起,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与此同时,以照顾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建立的里昂中法大学也拒绝勤工俭学生入学,而去向国内官僚贵族、军阀中的纨绔子弟招收学生。旅法学生对此非常愤慨,决定进占里昂中法大学。

在赵世炎、陈毅等同志的带领下,100多个学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占驻了一部分宿舍。可是中法当局根本无视勤工俭学生的合理要求,派来武装警



■ 五四时期的周恩来。

察,把这些学生押往法国兵营囚禁起来。记得赵世炎同志不知是用了什么办法从关押处跑了出来,到处交涉,奔走活动。有一天,他到巴黎找到我,由我代他拟了一个英文的电稿,发出一份呼吁电报(发往何处现在记不清了)。我又同他一起去向吴稚晖交涉,结果也是毫无用处。在中法当局的策划下,陈毅、蔡和森等 104 人,被武装押送回国。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在中法当局的迫害下失败了。对此我无比气愤,盛怒之下辞去了教书之职,离开了里昂中法大学。以后收入当然没有了,生活慢慢发生了困难。于是,1922 年 3 月我和刘清扬、周恩来一起转到了德国。

当时,在德国的中国学生已有一个党员,叫张伯简,后来又先后去了郑太朴、高语罕、章伯钧、孙炳文等党员,朱德同志到德国后是由周恩来同志和我介绍入党的。周恩来同志经常在巴黎和柏林之间来回奔忙、开会、联系中国学生、工人以及法国进步工人,参加各种活动,非常活跃。他从入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从没有停止过工作。我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在当时的合影,至今仍珍贵地保存着。

1923 年底,我离德经苏联回到中国,原打算到北京大学教书。可胡适不允。后经李大钊同志介绍,我到了广州,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广州的形势轰轰烈烈。一次,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邀我到 he 家长谈,谈话中他提出希望我推荐一些国外留学有能力的人,回国参加工作。我欣然应允,开了一个 15 人的名单,第一名是周恩来,第二个是周佛海(日本留学生),其中还有赵世炎。我说周恩来在国外生活,经济境况不太好,回来没有路费,廖仲恺答应汇钱去。1924 年四五月间,我写信给周恩来同志谈了此事,不久收到了他同意回国的复信。

周恩来同志回国后不久就参加了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1924 年 11 月他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三周年了。在这三年中,我们经常都在想念他,想到他的革命和斗争的一生,想到他的无产阶级崇高品质,想到他对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丰功伟绩,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他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

我曾经几次在周总理亲自领导和指挥下进行工作,所受到的教育是终身难忘的。现在我把 1927 年上海工人阶级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亲身的感受写在下面,作为我对他的纪念。

1926 年 10 月和 1927 年 2 月,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江浙区委的领导下,曾先后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和时机不成熟等原因,都暂时失败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尽管受到一些曲折和牺牲,并没有气馁,仍然拿出勇气,在积极准备的基础上,争取第三次武装起义。江浙区委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积极支持工人的正义要求,同意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认为这是挽救国民革命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报告了中央。中央有的负责人认为举行武装起义既无必要又无把握,担心因此而刺激帝国主义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完全站在上海工人阶级一边,针锋相对地指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既有必要又有把握,我们的起义是革命,是为了建立上海市民代表政权和建立工人武装,夺取军阀的武装以武装自己,是挽救国民革命危机的重要手段。我们工人现有的武器虽少,但有 80 万产业工人和广大上海市民的支持,有很多觉悟高



■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周恩来。

的工人纠察队员，只要把准备工作做好，是肯定可以取胜的。至于对帝国主义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来说，没有什么刺激不刺激的问题，你刺激他，他们是反共的，不刺激他，也还是反共的。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中央多数同志赞成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建议由他亲自指挥起义，务获胜利。

周恩来同志当时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又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参加过两次东征的指挥和镇压过广州反动商团暴动事变，是我党最有实践经验的军事指挥员之一。我们听到这一消息，非常兴奋，胜利的信心倍增。

中央会议后，周恩来同志就来到了江浙区委，参与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亲自参加上海各区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研究敌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情况，并制定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部署方案。

3月中旬，原驻上海的军阀李宝章部悄悄撤走，由直鲁联军的毕庶澄部接防。当时，北伐军的东路军已过松江，紧逼上海。毕庶澄部士气低落，纪律松弛。周恩来同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指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江浙区委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决定在3月21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3月21日，天气晴朗，早春的阳光，使人感到特别暖和。中午12时，工厂和轮船的汽笛齐鸣，宣告上海80万产业工人总罢工。



和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开始了。顿时，租界上的劳动大众人潮般地涌向华界指定地点集合，华界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则带着红袖套，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战斗岗位，震动全国的上海工人阶级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起义开始后，总指挥部设在闸北宝山路横浜桥南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这是一个半秘密的机关，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和闸北区委书记郭伯和都已在21日晨进入岗位办公。我当时是闸北区委委员并兼任区人民代表会主席和国民党区党部常务委员，在这次起义中，我分工率领全闸北区的群众队伍和少量武装纠察队，在后面为战斗的武装纠察队呐喊助威，并随时准备接受缴获的武器用以武装徒手的工人纠察队作为后备力量。战斗打响后，我在宝山路和青云路一带执行党交给的任务，当时心中总是挂着一件事，就是想见一见我们的周总指挥。正在此时，闸北区委书记的交通员通知我即刻到总指挥部去接受重要任务。当我一进入总指挥的办公室，就看到一位中等身材，身穿灰色棉袍，西装裤子，脚穿一双黑皮鞋，颈项里围了一条灰色围巾的人，乍看起来是一个平凡朴素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他正在看地图，听到我进入办公室，即回转身来看着我，他那一副浓眉，一双目光炯炯的俊眼，给予我极深的印象。郭伯和同志上前把我介绍给周总指挥，他说：“这就是黄澄镜同志”，当时我十分激动，因为我终于见到了周总指挥。周总指挥布置任务简单明了，当即严肃地对我讲道：“啊！你就是黄澄镜，我们刚攻占了第五区警察署，为了便于指挥战斗，决定在第五区警察署设前线指挥所，世炎和伯和同志因你对闸北情况熟悉，都推荐你去担任联络员，怎么样？”我当时感到十分鼓舞，立即回答说：“好！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如有差错，希望您随时纠正。”从此，在整个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我当了周总指挥的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前方的敌情，跟随他到最前线视察，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记忆最深的有以下几件事。

一、3月21日下午4时，根据各区的报告，除闸北区外，各区的战斗都已胜利结束，缴获了大批武器，武装了徒手的纠察队员。周总指挥当即决定，调集沪东、虹口和沪西的工人纠察队支援闸北，加强对北火车站的包

围,其他各区的纠察队就地维持地方秩序,搜索残敌,追查工贼、敌探,发动群众管制。

二.4 时许,据吴淞区委报告,敌毕庶澄部 500 人左右配备全副武装,并有轻机枪数挺,于早晨乘一列铁棚车开往吴淞,准备从海上逃跑,列车到达吴淞附近,发现吴淞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又掉转屁股返回上海,要上海方面注意。周总指挥接到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召集干部开会商量研究,在会上,周总指挥当机立断地说:“不能让这一列车进入上海,如让它进来,第一,会冲破我们的虬江路防线;第二,列车上的武装进入北站,将增加我们攻击的困难。”他对着地图郑重宣布:立即调铁路纠察队员一部于天通庵站南将铁轨破坏,闸北工人纠察队一部由区委书记郭伯和同志指挥,在天通庵车站以南铁路两侧构筑简单工事,就地埋伏,对列车上的敌人予以伏击。当列车翻倒后,即时开火,包围列车,务歼全部敌人。黄昏前后,敌列车缓缓驶进天通庵车站,机车司机预感列车会倾覆,就以敏捷的动作,提前跳离机车,无人驾驶的列车就慢慢倾倒了。两侧工人纠察队员按照总指挥部布下的天罗地网,以密集的火力向敌人射击,列车上的敌人毫无准备,车门因关闭反锁,无法打开,只能在窗口抵抗,列车很快即被包围。不久沪东和虹口的纠察队也投入了战斗,双方火力更猛烈了。天黑后,敌人利用时机,调整了部署,一部分士兵终于下了车,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整个夜里,打打停停,敌人想以此争取时间,待援兵到后反扑。周总指挥又命令一部分学生纠察队投入战斗,发动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杀”,“赶快投降”。经过一夜的战斗,敌人火力逐步转弱,我们工人纠察队员越战越强,越打越勇。最后,除少数敌人偷偷溜走外,其余 400 余人挂起了白旗,丢出了枪枝,全部被我俘虏。根据周总指挥的指示,用缴获的武器弹药武装了徒手纠察队,将轻机枪调给围攻北站的纠察队,以增强战斗力。

三.对东方图书馆,起义开始后即开始围攻。东方图书馆是一座四层楼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这里驻有敌一个军需处,带有一个排的兵力,并有两挺轻机枪,子弹很充足,敌方居高临下,不易攻下,而且射击的火力密集,对我方威胁很大。又因它地处宝山路中段,是我们总指挥部与前线指挥所必经的交通线,从战略上说,必须早点拿下,而事实上又不容易拿下。前线纠察队



当即把战斗的情况报告总指挥部,周总指挥接到报告后,即率领一批干部亲临前线,看了地形,周总指挥决定:为了减少伤亡,命令围攻东方图书馆的纠察队实行围而不打的办法;并要纠察队于图书馆前东侧挖百余米的交通壕以保护我们的交通线,我们打下了北站,这个孤立的据点,敌人自会放弃的。按照周总指挥的命令,我们采取围而不打,并对敌进行政治喊话,不多时,敌人迫于形势,同意停火,但不愿马上投降,我们即紧紧围住,到了次日下午,一部分顽敌偷偷换了便衣,带了物资,企图逃跑,纠察队一举全部俘虏了敌人。

四.围攻北站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敌人守备力量很强,北站的屋顶上有敌人重机枪阵地,西面铁路上停有白俄雇佣军的装甲火车,配有迫击炮两门,在宝山路和北河南路交界处有帝国主义列强的重机枪阵地。起义开始后,敌人不时射击,严重阻碍纠察队的行动。周总指挥在起义队伍占领第五区警察署后,即指挥对北站的围攻,为了尽可能减少伤亡,周总指挥作了周密的部署,决定从虬江路到北站间作三道防御工事,逐步接近包围敌人。按照周总指挥的部署,纠察队三个小队在轻机枪掩护下,在敌人前沿修起了三道防御工事。在工事的掩护下,对敌人进行攻击。黄昏后,敌白俄雇佣军的迫击炮和北河南路口的重机枪射击,引起宝山路东侧居民里弄着火,火借风势,延烧开来,居民扶老携幼,纷纷抢救衣物,一片嚎哭之声。周总指挥考虑到居民的安全和敌人可能乘机出击,立即亲临现场,一方面组织工人奋力救火,帮助居民抢救物资,有秩序地转移,另一方面加强前线火力配备,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果然,敌人乘我组织救火之机,冲击我们的工事,对我发动进攻。我们被迫后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总指挥亲自在前线指挥一支突击队冲上去,会合前线纠察队向敌人猛烈回击,把敌人打回北站,夺回防御工事。在火力掩护下,火灾也被扑灭了。周围居民看到总指挥直接指挥救火十分感动。第二天,总指挥带我们到前沿检查工事,居民纷纷献出家中的桌椅、木头和麻袋,给起义队伍加强工事。周总指挥又同起义战士们一起扛木头修工事,突然间,一颗炮弹落在附近,周总指挥立即卧倒,炮弹爆炸后溅得周总指挥满身泥灰,但他毫不在意,从容地掸去身上的泥沙,继续帮助整修工事。一个纠察队员

担心周总指挥的安全,对他说:“周总指挥,这里是前线,你的指挥位置,不在这里。”周总指挥笑着说:“当指挥员的怎么能不来?你们不是同样很危险吗?”纠察队员们听了都感动不已,翘起大拇指说:“周总指挥真是身先士卒的英雄。”我当时在旁边听后,也深受教育,更增强了战斗的勇气。

五.大火被扑灭后,后方报告:在灭火和敌人反扑时,近后方的群众队伍中,出现了不少谣言,说:“前方纠察队伤亡很大!”“起义看样子又要失败了。”根据调查,这是少数工贼、敌探有意造谣破坏,惑乱军心。周总指挥认为这个情况十分重要,必须采取措施,开展战场锄奸工作,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周总指挥当即命令我去执行这项任务。按照周总指挥的命令,我通过各个组织进行了调查,发动群众,果真揭发出有些工贼和敌探混在我们队伍中造谣生事,扰乱军心,当场经过审问,查明问题向总指挥作了报告。周总指挥决定,处决那些一贯为非作恶,民愤很大的工贼和敌探,经过群众通过后,立即执行。坏人被镇压了,谣言也消失了,大大地鼓舞了士气,稳定了后方群众的情绪,保证了起义的正常进行。

六.当时,北伐军东路军已到新龙华,南市工人纠察队修通了铁路,上海总工会汪寿华委员长派交际处长赵子敬同志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到新龙华慰劳北伐军。正逢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在召开军事会议。在会议进行中,接见了慰问团,赵子敬同志即将上海工人纠察队英勇地同军阀作战的情况作了汇报,并说,上海现在除北站外,都已解放了,希望北伐军早点进军上海,在北站同工人纠察队会师。当时,国民党右派反动头子吴稚晖起来发言,胡说:“北伐军绝不支援上海工人纠察队,让毕庶澄消灭了纠察队再进上海。”慰问团代表当即在会上愤怒回击,说:“上海工人纠察队完全有力量拿下北站,解放全上海,我们在北站欢迎北伐军。”慰问团回来把情况向周总指挥详细作了汇报,周总指挥说:“我们上海工人纠察队是有志气的,我们完全有力量拿下北站。”他又说:“吴稚晖的反动言论,恰恰暴露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啊!”周总指挥当即在前线指挥所召集前线纠察队的指挥员会议,把情况告诉了大家。会上决定,调整部署,把枪枝弹药、轻重武器全部集中起来,一定要一举攻克北站。

七.22日下午5时后,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敌毕庶澄向北伐军接洽投

